

■
编者的话

秋染彭城，菊绽重阳。本报“放鹤亭”栏目联合市作家协会推出重阳主题征文，撷取本土作家笔下的秋山、登高与敬老情思，共赴一场秋日之约。

秋日清光里，作者们用温情的笔墨，把“九九”惜老敬亲的传统意蕴，化作寻常人间烟火，既有登高望远、寄情山水的雅趣，也有体恤长辈、感念亲情的温热。重阳的内核，从来不止登临远眺，更在于珍惜相守的时光。愿读者展卷之时，同沐这一抹秋辉，在文字里感受山河静好，于流年之中常怀暖意。敬岁月，惜亲人，静赏人间岁岁秋光。

云龙山的重阳记忆

◎李继玲

一座云龙山，承载着我半生的重阳记忆，也见证着一座城的文明蜕变。

很多年前，我家老宅的对面就是徐州的云龙山。开窗见山，朝暮相望，年复一年的重阳烟火气，早已深深印在我的记忆里。

上世纪90年代的重阳节，是彭城最热闹的日子之一。徐州素有重阳登高的老习俗，每逢九月初九的前一天晚上，城里的男女老少便不约而同涌向云龙山，登高望远，把酒临欢。蜿蜒的石阶上人流不断，从一节山到三节山之间，随处都是临石而坐，大快朵颐的人们。

可热闹过后，总藏着揪心的一幕。游人尽兴登高，席地欢聚之后，清幽的山林总会变得狼藉一片。山道边、树荫下、石缝里，随处散落着食品包装袋、饮料瓶、纸巾残屑。秋风一吹，轻质垃圾随风翻飞，落在青松枝叶间，埋在层层落叶下，好好的秋日青山，一夜之间满目狼藉。

那时我年纪尚轻，每次听到广播里的报道，只觉得可惜，却从未真正放在心上。直到有一年重阳，秋风温柔，我和几位好友备上精致冷餐、瓜果饮品，趁着夜色登上云龙山。我们刻意避开人挤人的一节山主干道，在放鹤亭旁边寻了一处干净僻静的林间平地，芳草为席，青石为伴，远处云龙湖波光浅浅，氛围清幽又舒心。

重阳，被埋在心底的节日

◎张杏梅

20岁那年，我离开徐州。大学毕业，我被分配到南方的一座城市工作，算起来，已经在南方生活了30年。其间回徐州的次数，一只手数得过来，只是户口本上“籍贯”一栏还写着徐州。谁都清楚，籍贯是个标签，有人觉得是累赘，有人觉得是荣耀。

30年，我和徐州的联系基本只在节日里。春节、端午、中秋……一过节，徐州的形象便又在脑海里鲜活起来。但九月九不一样，它是埋在我心底的。

总记得重阳前一天，母亲就开始忙：提前泡上麦仁，说第二天的饽汤要现熬；门框上要挂一串红茱萸，每年都是她踩着凳子挂，说秋天这就算有地方落脚了。父亲只负责酒。每年重阳，他把菊花封进酒坛子，搁在屋角阴凉处。开坛那天，正好是一家人团圆的那天。

节就是这么过的，年年如此。后来才明白，所谓过节，不过是有人每年替你重复同一套动作，重复到你以为它本来就在那里。等没人替你重复了，节就塌了。

它是慢慢下去的。第一年，没人泡麦仁了；第二年，门框上光光的；第三年，已经想不起来那天有什么不一样。一年一年矮下去，最后矮成一个日子——日历上那两个字还在，底下什么都没有。

云龙山，徐州人重阳登高首选。小时候我跟父亲爬山，爬到放鹤亭就不走了，喝大碗茶，看山下云龙湖的水

面发亮。父亲说，从前有个山人在这儿养鹤放鹤。我说，鹤呢？他说早飞没了，就剩下像你爷爷那样的老头，天天上来锻炼身体。

在我现在定居的城市，山更高。公司组织团建，我爬到一半装作接电话，坐在半路喝水。不是体力不行，是那山不认识我。云龙山认识我，认识我小时候的膝盖，认识我的手。别的山，只当我是个游客。

徐州人过重阳，吃得实在。重阳糕、桂花糖都是有，但母亲更惦记早上那碗饽汤。她总在重阳前一天打电话来问“你那边买得到吗”。我说买得到，超市有。她说那能一样吗？熬的是鸡汤麦仁，冲的是精面。我说是。挂了电话，我也不会去买。糊弄她，也糊弄自己。

户部山戏马台也去过。父亲站在那里说，楚霸王当年就在这儿戏马。我那时候只惦记戏马台底下卖的糖炒栗子，如今才明白，他为什么在那儿站那么久。

登高，登的不是高，是你站在原地回头看的时候，看见来路有多长。这是年纪教给我的。小时候爬山，眼睛一直往上——还有几节到顶；到这个年纪再爬，眼睛是往下看的——从哪儿上来的，看那条路上还有谁。高度没变，方向变了。人这一辈子，前半半往上爬，后半半回头看。重阳这个节，就是给后半段预备的。

去年重阳，老同学发来一张云龙山的照片：饮鹤泉、

落叶堆里藏着的细碎杂物；年轻的志愿者把饮鹤泉、观景台周围的脏乱一一收拾干净。

那次清扫，不仅扫净了山间的污渍，也扫去了我年轻时的麻木与漠然，让我懂得人与山水相处，贵在珍惜。

岁月匆匆，一晃十几年过去，云龙山的重阳光景早已换了模样。如今的重阳，千年登高的习俗从未间断，登山的人依旧络绎不绝，却再也见不到往日遍地凌乱不堪的景象。很多游人登顶赏秋之后，都会自发停下脚步，化身临时志愿者。有人随手带走随身杂物，有人结伴清理卫生死角，有人细心扶起被踩倒的草木，还有人轻声招呼同行的家人：“看完风景，顺手把垃圾带走。”简简单单的一句叮嘱，成了重阳山间最温柔的新风，沉淀出一座城市的文明温度。

流年辗转，我也从意气风发的年轻人，走到了安稳退休的银发之年。只要身体允许，时间空闲，重阳节的前一天晚上，我和家人朋友依旧会如约登上云龙山，只是心境早已不同往日——年少登高，看的是人间热闹；中年自省，学的是责任担当；暮年登临，守的是山河初心。重阳登高的意义，从来不止风雅望远的民俗本意，更是站在山的面前，学会谦卑，懂得回馈。

岁岁重阳，今又重阳，终究是人不负山，山，定不负人。

观景台，挤挤挨挨的人。他说徐州打造彭城七里，火得不得了。我盯着看了很久，手机凑得很近，近到像在找什么人。找谁呢，说不清。

晚上给母亲打电话，说今年又回不去了。她“哦”了一声说，山在这儿呢，跑不了。又说，你爸那坛菊花酒，今年没泡，他一个人喝不动，浪费。这句话在我心里堵了很多天。父亲话不多，一年到头做的事就那么几件，重复了半辈子。封一坛酒，只等一个日子开。他不会说为什么，可我知道，他做的事归根到底是一件：把这一年一次的动作重复下来。他不知道这叫什么，只知道该做。

故乡是什么？说白了，就是有人替你留在原来的地方。你在千里之外过日子，缴房贷，掉头发，敲键盘，你以为自己在往前奔，其实身后一直拖着一根线，线的另一头拴着一座不动的山和两个越来越老的人。

30年，我把徐州过成了籍贯，把云龙山过成了照片。可九月九一到，风一转凉，我还是会想起放鹤亭的大碗茶，想起门前的红茱萸，想起饽汤和桂花酒。

今年重阳节在10月18日。我没告诉母亲，提前订了票，打算拎一罐桂花酒突然出现。她肯定又要说，回来做什么，又不过年。我就说，回来看看山，还有那个火起来的“七里”。

山不跑，我也该往回跑了。

去年重阳不可说

——苏轼在徐州的两个九月初九

◎韩亦可

在徐州，重阳登高是惯例。可今年我没打算去登山。

我去了趟彭城七里。这条线南起云龙山脚下的下圆墩遗址，北抵故黄河畔的黄楼，七华里，串着二百三十五处遗存。从四千三百多年前的一处龙山文化遗址出发，穿过汉墓、明城墙、层层叠压的城下城，最后停在黄楼上。走完用了一个下午，像把一部极其厚重的书匆匆翻过一遍。

我原以为黄楼只是这条线的终点。到了才明白，它是这条线的答案。

苏轼在徐州只过了两个重阳。

第一个在水里。熙宁十年，他40岁。四月到任，上任刚满四个月，黄河在澶州决口，八月水至彭城，城下水深二丈八尺。他在城墙上搭起草棚住进去，《宋史》记了他八个字：“庐于城上，过家不入。”七十余日，水退。

那一年的九月初九，徐州城墙泡在水里。菊花开了没人看，酒摆着没人喝。他后来写进《九日黄楼作》里：“黄花白酒无人问，日暮归来洗靴袜。”

重阳诗里向来只有登高、插茱萸、饮菊酒、望远、思人，没有“洗靴袜”的位子。可苏轼写了。他那天最深的记忆不是思念，是一双沾满泥、脱不下来的靴子。

第二个重阳在楼上。水退后的第二年，他拆了废弃的霸王厅，用那批木料在东门城墙上建起一座楼，外面涂满黄土——五行里土克水，取名黄楼，取“土实胜水”之意。楼成于元丰元年的秋天。那年的九月初九，他站在新楼上，第一句话是：“去年重阳不可说。”

我站在黄楼下，忽然想明白这座楼为何偏要落成在重阳。

古人重阳登高，本为避祸：爬到高处，躲开地面上即将到来的灾祸。这是一个关于“逃”的节日。而苏轼造这座楼，是为了让徐州以后不必再登高——他要的不是让人爬得更高，而是把水挡在城外，让人能安稳待在地上。

一个节日教人往上跑；一个人造了座楼，让人留下来。元丰元年的九月初九，苏轼站在自己建的楼上，把去年那个泡在水里的重阳重写了一遍。他没有写思念，写的是一双靴子。

畅怀苏轼与徐州的人，常想云龙山。那里有放鹤亭，有“春夏之交，草木际天；秋冬雪月，千里一色”。但苏轼上云龙山，多在春天。那首流传最广的“云龙山下试春衣，放鹤亭前送落晖。一色杏花三十里，新郎君去马如飞”，作于元丰二年春，是送一位蜀中举子赴京殿试的别诗。杏花、春衣、快马、少年，没有一样属于秋天。

苏轼在徐州的秋天，其实在黄楼。

可徐州不管这些。它照样把苏轼请进春天，把王维请进茱萸寺。且不论王维登过大洞山，那句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原是写给别处的兄弟；苏轼上云龙山时想的也不是重阳。一座城市擅长把名人的一瞬，收容成自己的千年。

不能说这是错的——九百多年后，我在黄楼下想起的确实是苏轼；而那句诗，也真在城南的山上一年年被重新念起。

元丰元年的一个秋夜，苏轼夜宿燕子楼，梦见唐代的关盼盼，作《永遇乐》。“燕子楼空，佳人何在，空锁楼中燕。”楼还在，人没了——这原是“遍插茱萸少一人”的另一种说法。同一座城，隔了三百年，被两个人各写了一遍。

而让我久久站住的，是全词末句：“异时对，黄楼夜景，为余浩叹。”他说是：将来某一天，会有人站在这座楼上，对着夜色，为当时的他叹息一声。

怀古向来是今人凭吊古人。他反了过来——他替千百年后的人，预先写好了凭吊他的姿势。

九百多年后，我站在黄楼下，为一位故人写下这些字。他猜中了。

九月初九，两个九，一年里顶接近“十”，偏偏又不满。像“少一人”，永远差那一个。也像苏轼：黄楼落成的那天他并不知道，七个月后将离开徐州，再过几个月便是乌台诗案，险些送命。这是他后半生漫长的颠沛开始之前，最后的安稳。

他建楼时不知道这些。他只是想，明年水再来的时候，城里的人不必再登高。

彭城七里，横着量有七里，我从南走到北。可我总觉得这七里，不能只横着看——还得向下看，看那个在水里洗靴袜的人，看他没来得及登高的那一年。

